

在北大听讲座

张岱年题

新世界出版社 第三辑

文 池 / 主编

思想的魅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北大听讲座 (第三辑): 思想的魅力/文池主编.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0. 12

ISBN 7-80005-544-2

I. 在… II. 文… III. ①社会科学-中国-文集

②自然科学-中国-文集 IV.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0463 号

在北大听讲座 (第三辑) ——思想的魅力

策划: 陈子寒 张若斯

主编: 文 池

责任编辑: 周奎杰 慧 钰

封面设计: 大象工作室

封面插图: 卜 桦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电话: (010) 68995424 (010) 68326679 (传真)

发行部电话: (010) 68995968 (010) 68998733 (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 www.nwp.com.cn

本社英文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 nwpcn@public.bta.cn

版权部电子信箱: rights@nwp.com.cn

版权部电话: +86(10)68996306

印刷: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70 千字

印张: 9

印数: 33001~36000 册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005-544-2/G·232

定价: 19.80 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征集讲座稿的启事

亲爱的朋友：

为了将散落在各个大学里的思想、文化资源留存下来并汇集出版，我们以最大的真诚邀请您参与我们的工作。如果您愿意且可能收集到您身边大学里的讲座（或其他学术资源），请您与我们联系，我们将遵循“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原则，以严谨、务实、开放的态度创造具有较高思想价值和可读性的出版物，您将获得应得的酬劳并可以 8 折的优惠价格购买我们推出的任何图书。

此外，我们长期关注各种优秀的人文作品，若您有这方面的发现和建议也请与我们联系。

希望与更多有思想、有创造力、有热心的人成为朋友。
我们的联系方式是：

北京市 86-160 信箱 文池 收 邮编：100086

E-mail: asnl@263.net.cn

谢谢你们。

新世界出版社



目录

- 大江健三郎 致北京的年轻人 / 1
- 周汝昌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 / 23
- 张岂之 百年中国史学回顾 / 39
- 戴锦华 大众文化包围中的文学 / 53
- 戴锦华 九十年代的中国电影 / 75
- 谭需生 中国新时期的戏剧 / 95
- 唐晓渡 当代诗歌先行者 / 115
- 王岳川 海外汉学家看后现代主义 / 125
- 荣维毅 女性主义与后现代 / 143
- 李 强 经济与社会 / 165
- 厉以宁 区域发展新思路与中国西部大开发 / 183
- 宁 骚 西部开发政策的文化分析 / 205
- 温元凯 从华尔街看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和机遇 / 221
- 汪建成 中西刑诉文化差异之原因 / 251

大江健三郎

致北京的年轻人

大江健三郎

1935年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瀬村(今内子町大瀬),这里的自然环境、民间习俗,对大江健三郎后来的创作颇有影响;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热衷于阅读加缪、萨特、福克纳、梅勒、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6年入东京大学法文专业,小说《死者的奢华》成为日本文学界最为推重的“芥川文学奖”候选作品,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称赞这篇小说显露了作者“异常的才能”;1965年赴美国,参加哈佛大学的研讨班;1993年创作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1994年瑞典科学院宣布大江为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主要作品有《个人的体验》、《冲绳札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

[按]“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9月28日在清华向清华北大师发表正式演讲前,模仿中国著名剧作家曹禺的神态,用夹生的汉语说。

1960年,大江健三郎随同日本作家访华团第一次访问中国,专程拜访曹禺。大江对曹禺说:“你写《雷雨》时在读大学,我也是在大学开始小说创作的。”

大江年轻时非常喜爱的《雷雨》,是曹禺在清华读书时创作的。创作地点正是大江今天演讲的地方——清华图书馆。

大江说,在曹禺当年创作《雷雨》的地方,与“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这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

大江以其“存在主义本土化”小说创作而获得世界声誉,代表作有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性的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他概括自己的“文学上的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

此次访华前,国内刚刚翻译出版了他的自选集和随笔集。

大江在演讲中介绍了他“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以及“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方法”。

大江是一名“知识分子作家”，他正关心着三个问题：一是核武器问题，二是环境问题，三是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共存共生”的问题。他对日本“国家主义”倾向，二战期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侵略屠杀罪行，抱有警惕和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说：“石原慎太郎当选东京都知事，是东京都市民的耻辱。”

大江先生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他是第二位应邀来华访问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当年泰戈尔访华一样，大江对中国的访问受到了国内文艺界的广泛关注。

他在清华图书馆向清华、北大师生发表的演讲题目是“致北京的年轻人”。

在北大演讲

需要说明的是，演讲虽在清华图书馆举行，但却是面对“清华、北大”师生共同进行的，把大江先生的讲稿收进本书应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愿读者诸君不要感到意外。

—

能够和中国的青年学生们直接谈话，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喜悦。在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的阶段，我听说大家对我从一个“学生作家”起步的生活历程颇为关心，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在我发言之后，回答大家提问的时候，可以具体地、轻松地愉快地展开。在这里，我首先想谈的是，在我这样一个作家的生活里最为根本的，以及我对我所意识到的培育自己成长的文学与社会的思考。

回顾成为作家之前孩提时代的生活,首先不能不谈到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太平洋战争,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了日本社会的基础。但是,在那个时代,在我生长的山村,还有另外一种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对立的思想,以地方历史或口头传说、民俗神话等形式存在着。在我的孩提时代,把这些讲给我的,是我的祖母、母亲等民间的女性。我通过她们的故事,知道了自己的村子,以及自己的近世的祖先们面对从东京来的国家派出机构,用武力进行抵抗,曾经举行过两次暴动,特别是后一次暴动,还获得了胜利。那次暴动,是从1867年到明治维新前后之间举行的,并且,是在明治近代国家体制起步之后——在那开始的混乱时期——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方农民势力战胜了国家势力。

关于这两次暴动的记忆,都从官方的记录里删除掉了,在学校的教育里,对此完全置若罔闻。但是,这些在山村妇女们的故事里,通过土地、风景以及和故事中的人物血脉相联的家族,生动地传承了下来。

一方面,在自己的家庭生活里,是女性们讲述的土地的历史、传说;另一方面,则是在学校里学习的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以天皇为中心的历史和传说。我徘徊于两者之间,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现在,回顾这段经历,特别感到有意思的是,少年时代的我,既相信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又从没有怀疑过山村的历史和传说。我终于发觉,那时,自己是非常自然地生活于二重性和多义性之中。我想,这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女性们的讲述方

式非常巧妙的缘故。

我母亲所讲述的，是早在日本成为近代国家之前，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流传、与民俗的宗教感情密切相联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在国家把奉天皇为神明的信仰作为日本的意识形态之后，仍然生动地存留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

就这样，在具有二重性、多义性的民众意识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共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在还是孩子的时候经验了日本的战败。并且，那是天皇用人（而非神）的声音宣布的具有打击性的经验。从那以后，在战后 10 年左右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最为高涨的时代，我从少年成长为青年。战后 10 年的后半阶段，在日本，兴起了认为作为宪法原则的民主主义和和平思想未必需要认真地推行这样一种社会风潮。但我认为，我是通过在战后民主主义时期接受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了自己的社会感觉。

在北大

在小说创作的同时，我所写作的时事性的随笔、评论，始终是把经验了从奉天皇为神明的国家主义的社会，向以独立的个人横向连接为基础的社会的大转变，最后自觉地选择了民主主义这样一条轨迹作为一贯的主题。现在，在日本的传媒上，所谓公大于个人，并且，把这个公等同于国家的公，诸如此类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再次成为一种强势，在这样的时候，我必须坚定地坚持贯穿自己人生经验的思想。

另外一个话题,我想谈一谈有一个身患残疾的儿子对作为小说家的我的决定性影响。我的大儿子大江光,出生的时候就患有智力障碍,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但是,作为年轻的父母,我和妻子决心为这个婴儿的生命负起责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必然的要素。

特别是,当我想通过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而重新塑造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存方式的时候,渐渐地,我认识到,自己的家庭里有这样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对我来说,是意义极为深刻的必然。

恩惠的魅力

在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通过自己有过的动摇和痛苦,以及自己把握现实的能力的丧失,不得不重新检讨了两件事情。其一,像刚才已经说过的那样,我经历了那样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进入大学学习法国文学,在我的精神形成过程中,法国文学作为坐标轴发挥了作用。其中,萨特是最为有力的指针。但是,身患残疾的儿子诞生的几个月里,我终于明白,迄今为止我坚信已经在自己内心里积累起来的精神训练,实际上毫无用处。我必须重塑自己的精神。

虽然那时还不是结构主义的时代,但是,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被解构了,我必须重新建构,以自己的力量,重新检讨塑造自己的法国文学和法国哲学所导致的東西。并且,我重新学习法国的人

道主义传统。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一位拉伯雷研究专家，拉伯雷时代的法国人道主义的形成，是他毕生研究的主题。我也从中感受到了某种和偶然相缠绕的必然。

另一件我必须重新检讨的事情，就是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一直写作的小说，在当时，对于因为残疾儿诞生而动摇和痛苦的我，究竟有效还是无效？我想重建如此动摇痛苦几乎绝望的自我。激励自己需要从根本上恢复的作业。

于是，我想把这样的作业和新的小说写作重合起来，我写出了《个人的体验》。当我写出对自己来说意味着新生的小说的时候，我已经能够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和残疾的孩子共同生存这一事实了。

在北大

同时我也认识到，如此获得恢复的我，面对自己国家的社会状况，也必须采用新的视点。因为我热衷于个人家庭发生的事件，已经看不见作为社会存在的自己的积极意义。

我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开始就是出于这样的动机。由此我也很自然地投身于原子弹受害者们的社会运动。关于广岛，我写了一本书，并把在那里的学习所得和发现，反馈到了自己的小说中。

和身患残疾的孩子共同生活了6年以后，也似乎是偶然的，发现孩子对野鸟的叫声很感兴趣，我和妻子创造了和孩子沟通交流的语言。不久，孩子的关注点从野鸟的歌声转向人工的音乐，我们的家庭也迎来了新的局面。

而作为作家，我也把我和发生如此变化的残疾儿子的生活写进了小说。尽管如此，在《万延元年的足球》这

部作品里,残疾儿的存在还是退到了小说的背后。这部小说,是把日本近代化开端时期最初向美国派遣外交使节的年份,和从那时起百年以后围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改订而掀起的市民运动对照起来描写的,表现了这样一个大主题。这并不能以此说明残疾儿的存在退到了小说背后的原因。在写作这部小说的过程中,我的关心也常常在怎样推进和残疾儿共同生活上。

在这部小说里,我主要刻画了没有和残疾儿共同生活下去的勇敢的年轻夫妇是怎样颓废的。从消极的侧面,观照自己的家庭问题,所以,对我来说,这部小说也仍然是从和儿子共同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三

但是,把和自己家里的残疾儿子共同生活这样事情作为所有小说的主题,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行为吗?我想,大家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自己也常常直接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以为,我正是通过克服这个疑问的具体行动,从而积极地向前推进了自己的文学创作。

当我还是法国文学系的学生的时候,我最初写作日语小说是出于以下动机:第一,我想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的一般文体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仍然在继续最初的想法。当然,从事小说家的工作已经40年,在实践过程中,我对文章、文体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设定明确的意图,破坏作家已经创

作出来的文体,这是有意识引导的变化;还有一种,则是可以称为自然成熟的变化。

但是,我并没有偏离在22岁的时候确立的创造日本小说迄今未有的文体这一根本的方针,也没有产生把这一方针改换得更为稳健的消极想法。

我的小说创作的动机之二,是想描述自己战争时代的童年和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青年时代。我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反映了一个在日本的偏远地区、森林深处出生、长大的孩子所经验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在作家生涯的基础上,我想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日本的文学,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一个明显可见的缺点,是缺少提出方法论的意识。我从阅读拉伯雷出发,最后归结到米歇尔·巴赫金的方法论研究。以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观点,把东京视为日本的中心,把天皇视为日本文化的中心,针对这种观点,巴赫金的荒诞写实主义的意象体系理论,是我把自己的文学定位到边缘、发现作为背景的文化里的民俗传说和神话的支柱。巴赫金的理论,是植根于法国文学、俄国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化的产物,但却帮助我重新发现了中国、韩国和冲绳等亚洲文学的特质。

作为一个小说家,我想要创造出和日本文学传统不同的文学,但自从自己的家庭出生了一个智力有障碍的孩子,和这个孩子共同生存,就成了我的小说世界的主线,对此,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因为在日本文学里,特别是近现代日本文学里,有所谓“私小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文类。这是一种用第一人称“我”来描写作家个人的日常

生活的小说。在作为一个作家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当然是和“私小说”这种文类对立的。我也曾经批判说,在日本文学中根深蒂固的“私小说”文类和这种文学传统,阻碍了日本文学的普遍化和世界化。那么,我以残疾儿童的家庭为舞台写作“私小说”,这不是一种根本上的转向么?这是贯穿许多对我所进行的批判的一个共同论点。

可是,其实我是想通过颠覆“私小说”的题材和“私小说”的叙述方法,探索带有普遍性的小说。从刚才我所谈到的巴赫金的理论向前追溯,我把俄国形式主义作为这些小说的方法论。我还认为,通过布莱克、叶芝,特别是但丁,通过对他们的实质性引用,我把由于和残疾儿童共生而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的神秘性的或者说是灵

的体验普遍化了。

同时,我把写作这些小说期间日本和世界的现实性课题,作为具体落到一个以残疾儿童为中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投影来理解和把握,持续不断地把这样的理解写成随笔。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残疾孩子的诞生和与其共生这样一个偶然事件,和对此的有意识的接受,在那以后,经过了37年,到现在,塑造了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现实。

四

最后,我想谈谈现在正在写作的小说。首先,这部作品使用了极其私人性的题材,这和刚才我所谈到的内容重合,可能会成为让大家感兴趣的一个条件吧。

二战结束后不久,在我所出生的岛屿——四国岛上最大的一个城市的高中读书。在这个地方城市里,有CIE、美国情报文化教育局设立的图书馆。在那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的原版书,在这以前,我曾读过译本,非常喜爱,并终生受到它的影响。

在读高中的时候的一个朋友,也给年轻的我以影响。我曾经和他一起接触过美国兵。这位朋友,后来成了电影导演,创作了获得世界性好评的《蒲公英》等作品。他就是伊丹十三。我和他的妹妹结了婚,刚才说过的残疾孩子,就出生在我们这个家庭里。我们的儿子大江光,现在还遗留着智力障碍病症,但已经用对他而言惟一可以自由表现自己的语言——音乐,创作了表达他内心世界的作品。伊丹十三根据我的小说,原样使用大江光的音乐,导演、摄制了电影《安静的生活》。在这以前,伊丹摄制过正面批判日本暴力集团的电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受到暴力集团的行刺报复。这不仅给他的肉体造成创伤,也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创伤。在那以后,伊丹突然自杀。

我想重新认识、理解伊丹和既是妹夫又是朋友的我,和他的妹妹我的妻子,还有我们的儿子大江光四者之间的长久的关系。在不断思索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战争失败后不久,和占领军美国兵的关系,也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重要的事件。

可是,我一直没有找到把这个事件写成小说的线索,直到去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校区停留期间,好像是偶然的,我读到了森达克的日常谈话记录和以此

为主题的卡通《在那地方的外边》，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我的妻子，看到少年时代非常美好善良的哥哥突然发生变化所受到的冲击，并成为永远的心灵创伤，还有，生了一个和正常人不同的孩子，为了把存在于遥远的地方的那个正常孩子抢救回来，发现了不正常的孩子和自己之间的共同语言——音乐，森达克的书，启示我深入理解这些事情的意义。

森达克的卡通，以欧洲的传说故事中的变形为主题，故事内容是：一个婴儿被可朴林盗走了，作为他的替身，留下一个奇怪的生物。为了救回被盗走的婴儿，姐姐不断努力，最后终于救出了妹妹。我把这个故事里的姐姐阿答，一位勇敢而美丽的少女，和我的妻子的孩提时代重叠，由此找到了自己小说的根本的叙述方式。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过来的年轻人，无论是我还是伊丹，还有头部畸形的光，不都是被可朴林偷盗走的真正美丽的孩子的替身的变形么？

恩惠的魅力

同样，正是由于一位既是妹妹、又是妻子和母亲的女性的勇敢的劳动，创造了我们的家庭。而就在这个美满故事进行的中途，她的哥哥突然自杀了。

我一边写作自己的变形小说，一边思考这样的问题。可以认为，这不只是伊丹十三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度过青春，生活在经济繁荣和繁荣以后长久持续的不景气时期、现在面临老年的我们这一代日本人的现实性课题。

现在，回答大家的提问，进行自由对话吧。我在准备